



S U P P L E M E N T T 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一〇六期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9612a)

1.【历史资料】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最后岁月	王 凡
	江青火烧田家英	洪 洋
2.【回首往事】	江青与我的“解放”	汪曾祺
	北京看守所的学习班	张郎郎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 cnd-cm@cnd.org, 来稿请寄: HXWZ@cnd.org

CND 邮址: CND, P.O.Box 10111, Gaithersburg, MD
20898-0111, U.S.A.

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 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谢谢!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 除非本刊另有安排, 请勿在营利性出版物上转载。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历史资料】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最后岁月

• 王 凡 •

(一)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标志著文革兴起的“

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

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著。

五月廿二日，是个星期天，下午三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逢先知溜达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约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

这的确是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成为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属，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个科长。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文件清点到五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走了，戚本禹逗留到较晚，才带著清点的大部份文件离去。

文件清点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会儿，打开了一个此前撇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致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

这是他跟毛泽东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可他舍不得丢掉。一方面他酷爱毛泽东的书法，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收藏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诗作。

田家英时常抚摸著精致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著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午夜十二点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邪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董边见丈夫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田家英站著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董边，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十三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田家英与江青、陈伯达交恶，已不是三年两载，董边早就清楚。自田家英被任

命为毛泽东秘书后，就和江青有过接触。

久而久之，博学多识，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田家英，对学识浅显，却又在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上几度急于露峥嵘的江青，越来越轻蔑。他对江青不敬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白，久而转为嫉恨。

至于陈伯达，田家英与他共事长达二十五年，但从第一次接触就颇觉心寒。当时他和中宣部的一些年轻干部，参加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在该书的行文及查阅核对摘录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竟质问田家英干了些什么，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概抹煞。时间久了，田家英对他总是窥探毛泽东的意向，搞政治押宝，打小报告排压他人的品行，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时一点面子都不留地给予讥刺。

田家英很清楚，戚本禹敢于对他颐指气使，完全是因为有江青、陈伯达企图加害于他的背景。对此，他并不畏惧，否则，他早就可以柔化对他们那毫不掩饰的蔑视。

（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凌晨，心事重重的董边再也睡不著了，既惦记著横遭打击的丈夫，又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国妇联机关党组做检讨一事所缠绕。《中国妇女》杂志被认为跟不上思想文化战线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

她起身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

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几十年以沫相濡，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点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理解与沟通。这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的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他只问了董边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董边答道：“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她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复杂，倒感觉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静了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关于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那天上午，有人来过田家英的永福堂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建国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建国后，田家英所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与何均任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楼”，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著不时的交往。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风闻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还没有听到正式的传达，他更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更确切的情况。

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过这场风暴，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凉气氛，他只记住了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可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田家英把他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

临近午饭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秘书室行政负责人、逢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然后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毛泽东的书房里，好像有人。三人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著。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沈海底。”

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跟著他的还有杨德忠。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立即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据当事人之一王力回忆，五月二十三日午后，王力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约两点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会场。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杀了。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被通知去中南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下午三时左右，惦记著丈夫的董边，刚把机关的事情了清，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董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声音，要她立刻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

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无语凝咽……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多远，但董边已经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著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著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苦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董边身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离开了永福堂。

据传闻，田家英的尸体，还是在做了解剖之后处理的，没有留下一点遗骸。

（三）

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一九六五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也住在这座大院里。在那些日子里，董边除了在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同时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他们毫不掩饰对董边交代的不满。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岗位的特殊，所以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同家人言论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了。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可能属于要如实汇报的范畴：

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六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就早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乾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来的答覆是：“主席说不要著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述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抱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对田家英的工作及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董边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边是个性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的批评道：“政策上的情况，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思前想后的董边，最终想起这桩几乎被遗忘的事情，便向三人小组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在场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董边，你不要再说了！”临谈完话时，安子文再次要董边以党性保证，绝不再提此事。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第204期

∞ ∞ ∞ ∞ ∞ ∞ ∞ ∞ ∞ ∞

江青火烧田家英

• 洪 洋 •

◇ 《海瑞罢官》祸起萧墙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随口向田家英等人谈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当时觉得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太牵强附会，而且据了解，吴晗之所以写海瑞，是因毛泽东在以往的一次讲话中盛赞过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还说过，“要发扬海瑞精神”，吴晗与彭德怀毫无关系。

于是，田家英在整理毛的谈话稿时，提出《纪要》可删去一些话，关于《海瑞罢官》的一段话可以删掉。当时田家英不但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兼机要秘书，还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所副主任。凡是毛的重

要讲话，他都亲自或令手下人将其整理成文或纪要。既然是政治秘书，自然有权删掉一些他认为应该删掉的内容。当时的具体执笔人是秘书室的关锋，他对田家英的看法并未表示反对，只是说了一句：“删掉这一段行不行？”田家英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毛在庐山上的谈话为例：当时毛的原始会议谈话上有一些话“不宜入文”。例如毛泽东曾说：“屁有香臭。不管谁放的屁都要闻一闻，是香还是臭？我放的屁中央要闻一闻，中央放的屁下面也要闻一闻，是香屁还是臭屁？”很显然，毛的这些怪论如果入文的话，只会产生“副作用”。田家英回到北京永福寓所后，还和当时参加一些谈话的胡绳一起探讨过此事。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后来回忆说：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对笔记，手持香烟紧锁眉头，似乎很为国家担忧。

谁料关锋竟是一个借整人往上爬的人，他到江青那里告了田家英一状。当时江青正想取代田家英成为毛的政治秘书兼机要秘书，或曰“第一秘书”，于是开始大作文章，指责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

◇ “京兆书生”田家英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四八年起就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给自己定的准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委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调查，检查“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了三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却是要求包产到户。六月底返京后，田家英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汇报了情况，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田家英介绍了其他地方的情况，都差不多。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刘少奇还说，让田家英先不要说出是我的意见，再听听毛主席和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又征求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意见，大家基本上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试行多种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田家英还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等生产恢复了，再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一贯主张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田家英见毛泽东不高兴，就没有讲别人，只承认是自己的看法。后来，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挨了几句批评，但他仍没有牵扯别人。

这一回，撞到了江青的手中。江青对毛的女秘书不敢作声，对毛的男秘书却火气很大。她很快上纲上线，认为田家英仍在思想上包庇彭德怀，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在抵制上海批判《海瑞罢官》。

◇ 上海滩一支笔点燃文革

江青从政后得到康生的点拨，顿开茅塞，两个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自然一唱一和。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难批判长篇小说《刘志丹》之后，一九六三年五月江青组织人在《文汇报》上批判昆剧《李慧娘》，点了作者孟超和为它写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赞扬文章的廖沫沙，到了一九六四年，大批判卷入意识形态，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翦伯赞的历史学观点，及文艺界的夏衍、田汉、阳翰笙、绍荃麟、齐燕铭等都未能幸免。不过批判仍局限在学术界，没有形成运动。

但真正算得上“点燃文革”的一把火，从批《海瑞罢官》始，江青在北京没什么威望，“人微言轻”，在老毛那里是挂名夫人，在许多高干眼里是个“戏子”而已。于是，江青又跑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张春桥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此人三十年代就认识蓝苹（江青的艺名），曾在上海滩上有过交往。俩人经过一番密谋，认为要批判一部叫《海瑞罢官》的作品，掀起一番斗争高潮，文章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姚文元执笔，并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名为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因涉及彭德怀这个高度敏感的大案立即轰动全国。

本来，毛泽东在若干年的反思后，对彭德怀的看法已有了一些转变，甚至委派彭德怀去抓三线建设，还说：“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真理可能在你一边。”“你先去西南，过几年带兵打仗，为恢复名誉作准备。”毛泽东是个理念很复杂的人，另一方面，他又不允许别人对他的错误否定。姚文元文章出笼后，把《海瑞罢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与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等等。文章使老毛无法从自己的错误撤退。对于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动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一无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蒙在鼓里。毛泽东却欣赏姚文元文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向田家英、陈伯达谈了几句对《海瑞罢官》的看法，这也就是所谓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的背景。田家英坚持实事求是同情彭德怀其实是很自然的，假若没有江青去策划批《海瑞罢官》，彭德怀和毛泽东的个人历史可能还会有某些改写。

◇ 最早的一位殉难者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对于《中国妇女》杂志社总编兼社长董边来说，是天塌地陷的一天，下午三点，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打来电话，让她立即返中南海西楼会客厅，董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主席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昨天，中央三人小组来到家中宣布田家英停职反省，距“五一六”通知发出不到一周。

在西楼会客厅，安子文、汪东兴代表组织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董边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可能？早上还好好的！”而安子文感兴趣的话题是：“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并要求董边认可田家英是自杀。董边见到了田家英的遗体，看到了他那忧郁而悲愤的遗容。就在昨天，安子文、王力、戚本禹向田家英宣布：中央认为田家英的思想一贯右倾，因此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当夜，董边和丈夫一道清理文件，深夜十二点钟，戚本禹打电话，要田家英去签字离职，田家英气得将电话摔掉：“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戚本禹是何许人也？他原是中办秘书室的一个普通干部，却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天天都想着往上爬，受过田家英的批评，后来写了一篇《评李自成自述》的文章，被陈伯达调到《红旗》杂志社，紧接着戚本禹投靠江青，成了她的忠实门徒并平步青云，田家英想到这里，悲叹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董边知道那两个人，一个是毛的名义夫人（江青和毛已经分居），一个是左派“理论家”。

记得六二年时，田家英包产到户问题受到批评就提出：让我下乡去做一个县委书记，但是毛泽东不放他走，田家英酷爱史学，文笔又好，毛泽东有些事情上还可以用他一下。没想到堂堂国君的秘书竟被迫死！江青火烧田家英志在夺权，并逼老毛表态。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田家英一贯右倾，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批胡风、批彭德怀他都不赞成。田家英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给江青定位是“研究国内外动态的秘书”，而她一心要当机要秘书，打倒田家英后，江青却猫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原来田家英交出的所有机要文件，并没有转给江青，“机要秘书”的头衔，毛泽东早已给了自己床上秘书张玉凤，江青咬牙切齿，但想到自己和老毛有约定在先，只好忍气吞声。

□ 原载《北京之春》第三十五期

~~~~~  
【回首往事】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江青与我的“解放”

• 汪曾祺 •

我的“解放”很富于戏剧性。是江青下的命令。

江青知道我，是因为《芦荡火种》。这戏彩排的时候，她问陪她看戏的导演（也是剧团团长）萧甲：“词写得不错，谁写的？”她看戏，导演都得陪着，好随时记住她的“指示”。其时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夏天。

《芦荡火种》几经改写，定名为《沙家浜》，重排后在北京演了几场。

我又被指定参加《红岩》的改编。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林默涵，好象还有袁水柏。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 ◇ 江青亲手抓样板戏

自六四年冬至六五年春我们就集中起来改《红岩》剧本。先是在六国饭店，后来改到颐和园的藻堂。到藻堂时昆明湖结着冰，到离开时已解冻了。

其后，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体验”结束，剧团排戏（排《沙家浜》），我们几个编剧住在北温泉的“数帆楼”改《红岩》剧本。

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剧团由重庆到上海，排了一些时候戏，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始。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江青对于样板戏确实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体，从剧本、导演、唱腔、布景、服装，包括《红灯记》铁梅的衣服上的补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有人说“样板戏”都是别人搞的，江青没有做什么，江青只是“剽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对于“样板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企图在“样板戏”和江青之间“划清界限”，以此作为“样板戏”可以“重出”的理由，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这一点，我同意王元化同志的看法。作为“样板戏”的过来人，我是了解情况的。

从上海回来后，继续修改《红岩》。“样板戏”的创作，就是没完没了的折腾。一直折腾到年底，似乎这回可以了。我们想把戏写完了好过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打来电话，给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叫我们到上海去。我和阎肃说：“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回了电话，覆电说：“不要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我，乘飞机到上海。住东湖饭店。

◇ “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李琪是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的。到了之后，他给江青写了一个便条：“我们已到上海，何时接见，请示。”下面的礼节性的词句却颇奇怪，不是通常用的“此致敬礼”，而是“此问近祺”。我和阎肃都不禁互相看了一眼。稍为知道一点中国的文牍习惯的，都知道这至少不够尊敬。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我们。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他们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是不要过问。”（这是什么话呢？我们剧团是市委领导的剧团，市委宣传部长却对我们的戏不能过问！）她对我们说：“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山，我不能适应。有一次飞过的时候，几乎出了问题，幸亏总理叫来了氧气，我才缓过来。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我们当时听了虽然感到有点诧异，但是没有感到这句话的严重性，以为她掌握了什么内部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后，回想起来，才觉出这是一句了不得的话，她要整垮四川党的决心早就有了。

她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由军队党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那有这样的事呢？一个地下工作者，不通过党的组织，去开辟工作；根本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一个人，单枪匹马，通过社会关系，发动群众，这可能么？）

我和阎肃，按照她的意思，两天两夜，赶制了一个提纲。阎肃解放前夕在重庆，有一点生活，但是也绝没有她说的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根本没有；我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但是我们居然编出一个提纲来了！“样板戏”的编剧都有这个本事：能够按照江青的意图，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个戏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提纲出来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我们在“编”提纲时，李琪同志很“清楚”，他买了一包上海老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一边“荡马路”，一边嚼倒咂嚙。

江青虽然不让李琪过问我们的戏，我们还有点“组织性”，我们把提纲向李琪汇报了。李琪听了，说了一句不凉不酸的话：“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哦？”

我们向江青汇报了提纲，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

◇ 向北京市摊牌

回到北京，着手“编”剧。

三月中，她又从上海打电话来：“叫他们来一下，关于戏，还有一些问题。”

这次到上海，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批《海瑞罢官》已经达到高潮。李琪带了一篇他写的批判文章（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不得不写一篇文章）。他把文章交给江青看看。第二天，江青还给了他，只说了一句：“太长了吧。”江青这时正在炮制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我和薛恩厚对这个座谈会一无所知。阎肃是知道这个会

的，李琪当然也会知道。李琪的神色不像上一次到上海时显得那么自在了。据薛恩厚说（他们的房间相对着，当中隔一个小客厅），他半夜大叫（想是做了恶梦）。

一天，江青叫秘书打电话来，叫我们到“康办”（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办公室）去见她。李琪说：“我不去了，——她找你们谈剧本。”我说：“不去不好吧，还是去一下。”李琪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汽车已经开出来在门口等着了，他还是来回走。最后，才下了决心：“好！去！”

关于剧本，其实没有谈多少意见，她这次实际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谈“试验田”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和阎肃都没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爽快地同意，只见她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很重。回到东湖饭店，李琪在客厅里坐着，沉着脸，半天没有说话。薛恩厚坐在一边，汗流不止。我和阎肃看着他们，我们知道她这是向北京市摊牌。我和阎肃回到房间，阎肃说：“一个女同志，‘老子’、‘老子’的！唉。”我则觉得江青说话时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

《山城旭日》写出来了，排练了，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戏就搁下了。江青忙着闹革命，也顾不上再过问这个戏。

剧团的领导都被揪了出来，他们是“走资派”。我也被揪了出来，因为是“老右派”，而且我和薛恩厚曾合作写过剧本《小翠》，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剧中有一个傻小子，救了一只狐狸，他说是猫，别人告诉他这不是猫，你看，这是个大尾巴，傻公子楞说：“大尾巴猫！”这就不得了了，这影射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革命群众”的想像力真是特别丰富，他们能从一句话里挖出你想像不到的意思。

#### ◇ 被革命的日子

批斗，罚跪，在头发当中推一剪子开出一条马路，在院内游街，挨几下打，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全国皆然，不必细说。

后来把我们都关到一间小楼上。这时两派斗了起来，“革命群众”对我们也就比较放松，不大管了。

小楼上关的，有被江青在“一一·二八”大会上点名的剧团领导，几个有历史问题的“反革命”，还有得罪了江青的赵燕侠。虽然只十来个人，但小楼很小，大家围着一张长桌坐着，凳子挨着凳子，也够挤的。坐在里边的人要下楼解手，外边的人就得站起来让他过去。我有一次下楼，要从赵燕侠身前过，她没有站起来，却刷的一下把一只左腿高举过了头顶。赵老板有《大英节烈》的底子，腿功真不错！

我们按时上下班，比起“革命群众”打派仗，热火朝天，卜昼卜夜，似乎还更清静一些。每天的日程是学毛选，交代问题，劳动。“问题”只是那么些，交代起来没个完，于是大家都学会了车轱辘话来回转，这次是“一、二、三、四、五”，下次是“五、四、三、二、一”。劳动主要是两项。一是劈劈柴。剧团隔一个胡同有一个小院子，里面有许多破桌子烂椅子，我们就把这些桌椅破成碎供升炉子取暖用。这活劳动量不大，关起院门，与世隔绝，可以自由休息，随便说话。另外一项是抬煤。两个人抬一筐，不算太沉。吃饭自己带。有人竟然带了干烧黄鱼中段、煨牛肉、三鲜馅的饺子来，可以彼此交换品尝。应该说，我们的小楼一统的日子，没

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一天一天这么下去，到哪儿算一站呢？

一天，薛恩厚正在抬煤，李英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隔十天半月到剧团来看看）对他说：“老薛，像咱们这么大的年纪，这样重的活就别干了。”我一听，奇怪，何态度亲切乃尔？过了几天，我在抬煤，李英儒看见，问我：“汪曾祺，你最近在干什么哪？”我说：“检查、交代。”他说：“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我心里明白，我们的问题大概快要解决了。

#### ◇ “解放”的来临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革委会的一位委员上小楼叫我，说“李英儒同志找你。”我到了办公室，李英儒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作一次检查。”我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派人来叫我，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一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行了。”我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又把我叫回去，说：“不用五分钟，三分钟就行了！”

过了一会，群众已经集合起来。三分钟，说什么？除了承认错误，我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

表了态，我就“回到革命队伍当中”了，先是在“干部组”呆着。和八九个月以前朝夕相处的老同志坐在一起，恍若隔世。

刚刚坐定，一位革委会委员拿了一张戏票交给我：“江青同志今天来看《山城旭日》，你晚上看戏。”

过了一会，委员又把戏票要走。

过了一会，给我送来一张请帖。

过了一会，又把请帖要走。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李英儒派人来叫我到办公室，告诉我：“江青同志今天来看戏，你和阎肃坐在她旁边。”

我当时囚首垢面，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烂不堪。回家换衣服，来不及了，只好临时买了一套。

开戏前，李英儒早在贵宾休息室坐着。我记得闻捷和李丽芳来，李英儒和他们谈了几句（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闻捷）。快开演前，李英儒嘱咐我：“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也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该说。恍恍惚惚，如在梦里。

快开戏了，江青来，坐下后只问我一个她所喜欢的青年演员在运动中表现怎么样，我不了解情况，只好说：“挺好的”。

看戏过程中，她说了一些什么，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

#### ◇ “向大西南进军！”

散了戏，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得很严格。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谢富治、陈亚丁。她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这个戏开幕后是大红的天幕，上写六个白色大字‘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当时我们就理解，她所谓“向大西南进军”就是搞垮大西南的党政领导，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烧得更猛。后来西南几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乱得一塌糊涂。

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他们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忽然江青发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女同志在一边不停地记，她脸色一变，问：“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军报的。”

“谁让你进来的？”

“……”

“我们在这里漫谈，你来干什么？出去！”

这位女记者满面通红，站起来往外走。

“把你的笔记本留下。你这样做，我很不放心！”

江青有个脾气，她讲话，不许记录。何况今天的讲话，非同小可，这位女同志冒冒失失闯了进来，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 ◇ “一朝国母”的风范

杨成武说了几句，门外喊“报告”，杨成武听出是秘书的声音。“进来！”秘书在杨成武耳边说了几句话。杨成武起立，说：“打下了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我去处理一下。”江青轻轻一扬手：

“去吧！”

江青这种说话语气，我们见过不止一次。她对任何干部，都是“见官大一级”，用“一朝国母”的语气说话。

谢富治发言，略谓“打开了重庆，我是头一个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据我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个人来！”

我当时就想：“坏了！按照他的逻辑，渣滓洞的存者，全是叛徒。”我马上想到罗广斌。罗广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这和谢富治这句斩钉截铁的断言是有（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的。

座谈结束，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公共汽车、电车已停驶。剧团不会给我留车。我也绝没想到让剧团给我派一辆车。我只好由虎坊桥步行回甘家口。走到家，天

都快亮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的“解放”，尘芥浮沤而已。我要揭出的是我亲身听到的江青的两句话：“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和“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我是一个侧面的历史见证人。因为要衬出这个历史片段的来龙去脉，遂不厌其烦地述说了我的“解放”，否则说不清楚。我的缕述、细节、日期或不准确，但是江青的这两句话，我可以保证无讹。

□ 原载《明报月刊》 1989年1月号 输入：周其弘

∞ ∞ ∞ ∞ ∞ ∞ ∞ ∞ ∞ ∞ ∞

北京看守所的学习班

• 张郎郎 •

在监所系统办学习班只是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零年的一段时间内，由军管会组织的。这是根据毛泽东的“学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重要批示精神而开办的。“学习班”集中表现出改造罪犯思想的典型程序。

一九六九年六月我被转送到半步桥北院的一个小院，在“学习班”里呆了三个月。

## 一、学习班的生活

1. 住宿：一两百个男犯人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白天不锁房门。夜晚才锁上小院的大门。这个小院在看守所的大院里，原本是犯工的宿舍。每间三、四十平米不等，住十几、二十人，比其他监号宽畅多了。房间里都有床，虽然连成通铺，毕竟比监号舒服多了，使犯人有回到社会的感受。许多犯人说：“已经是半个自由人了。”

2. 伙食：伙食和监号里一样。但主食的量宽松多了，基本可以吃饱了。副食也比监号里多了些。还可以申请一些咸菜，盐。

3. 卫生及福利：各项都比监号强多了，例如放茅：解手不在房间中了。厕所就在院子里，来去自由。又如洗漱池就在院子里，犯人们用水自由。卫生比监号强多了。也给了大量滚开水，烫洗铺板、被褥。大力消灭了多次臭虫，虱子也基本被清除了。

总之，政府的方针是：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尽量改善犯人们的生活状况。

## 二、学习班第一天

到学习班第一天，先清扫了房间；然后按照政府的安排分组入住。接着让人们搞个人卫生。犯人们都大洗特洗一番。他们几个月、几年来没这么舒服过。他们还把被褥晒在院子里，利用骄阳和热风扫荡了粘汗、霉菌。半天后人们已经焕然一新了。犯人们的心情顿时开朗多了。

下午在这样的气氛下召开了大会。一位头发斑白的军代表，举着《毛泽东语录》，高声宣布：“全体起立！让我们一起做三件事：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众犯跟着敬祝。）现在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众犯跟读。）再让我们一起高唱‘东方红’…”大家齐声高唱。

做完这三件事之后。有些犯人感动得痛哭流涕。有些犯人纷纷表态感谢政府把犯人当人看。他们很久以来没有享受过这些权利。当然，许多犯人将信将疑：政府是否有如此的诚意？至少大家都觉得政府准备释放这批人。

由于我们这批人是“政治犯”，其实多数人都是“言论犯”、“思想犯”，自然认为自己根本没有“罪”。所以更觉得这回肯定会得到释放。从此开始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思想改造。

### 三、改造思想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赞大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先由军队的李代表做动员报告：“同学们：刘少奇从前把你们从人变成鬼，现在毛主席要把你们从鬼变成人”云云。

重点学习几篇毛泽东的重要文章，例如：《将革命进行到底》，《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等等。

然后，由另一位军方的武代表作形势教育报告。讲国内外大好形势。例如“中国既无外债，也没有内债。这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例如“中国工农业产值都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例如“不久前，几个非洲妇女无限崇拜我们的伟大领袖；把毛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胸肉上，穿过沙漠，走过千山万水，终于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由此可见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北京已经是世界革命中心。”例如“我国已经拥有人造卫星，卫星航天的轨迹可以覆盖全球。全世界任何地方指哪儿打哪儿。还可以装上核弹头，国防力量所向披靡。”

然后分组讨论，在小会上反复领会。犯人们从报纸、杂志上找出来多方面的论据以证明毛泽东是几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伟人。我们能生活在北京，是无限幸福。我们犯罪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把认识“提高”到如下层面：

“我们要做到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伟大领袖毛主席。”刘少奇是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中了刘少奇的毒。

接着，各组选出代表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就这样，每天至少十个小时用来学“毛著”、开讨论会、听报告学习。领会了一个星期后，每个犯人必须写一份思想小结。在分组会议上一一通过。

第二阶段：忆苦思甜。

先由武代表作一个动员报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下，受尽了阶级苦、民族恨”云云。

然后由从某工厂的老工人作报告，讲他自己的苦难家史。

分组讨论后，轮流“忆苦思甜”。由于每个人在本单位都开过无数次类似的会，每个人都有一套现成的讲词。有两种人比较麻烦：第一种是我们这种青年，从来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武代表要我们控诉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我们就回忆：我们如何想要好好学习，学而优则仕。甚至有出国留学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第二种人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或是城市底层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城市平民。他们无法理解政府的意图，闹出了许多笑话。例如：一位农民忆了半天深重的苦难，吃不饱、穿不暖。问他这是什么时候？他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接着各组又选出比较成功的发言，在全体大会上再讲一遍。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讨论，每个犯人再写一份思想小结，也在小组一一通过。

第三阶段：认罪。

经过了上述两个阶段，多数犯人在思想上有如下的几种状态：

1. 第一种人原本是政府干部或共产党员，或是一直被政府信任的积极分子。他们一直在说服自己，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相信党”。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在非常的历史状态下，不免会有些偏差。或在群众运动中，自然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但他们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社会将恢复正常秩序。他们会得回自身的既得利益。

他们在这阶段非常积极，热情地歌颂领袖歌颂党。沉痛地忆苦，真诚地思甜。例如：有一位司局长级的干部，老党员，名叫李捷。当时已经五十来岁了，当了我们的组长。他十分认真，把犯人的小组长职位和局长职位看得一样重要，完全把自己当成不受薪的政府工作人员，把管理其他犯人看成是自己的职责，把向政府“汇报情况”看成共产党员“三忠于”的具体表现。

两个阶段的学习更坚定了他们的信仰，等于对自己的精神进行了一次保修，擦油泥，给他们的灵魂充了电。

这类人是政府“以犯治犯”政策下的依靠对象。

2. 第二种人原本是工人、教师、职员等，安分守己的社会中间力量。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好人”。只是下面一些造反派或积极分子公报私仇，使自己变成了这类坏人的牺牲品。但被颠倒的历史终将被再颠倒回来。他们相信主席相信党，但不相信下面的干部，盼望明君终将了解民情和盼望清官出现，理顺社会秩序，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工作环境。

这类人在当时占了大部份，当局明白对这类人要尽力争取。要进一步激化他们的宗教情绪。经过两个学习阶段，他们的“崇拜情绪”和“感恩情绪”已经大大高升。许多在入狱时被粉碎了信仰的“罪犯”，又找回了信仰的起动点，又有了安慰自己的道德依据，对自己的未来开始乐观。

当时我也是这类人，不断想象出去后如何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觉得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得益匪浅。觉得这里的确诚然如高尔基所说的：“监狱是一个社会大学。”从最底层反观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全貌，似乎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有重新开始生活的强烈愿望。

我们这类人是政府争取的对象。



3. 第三种人原来已经由于“反动家庭出身”或本人“犯过错误”等等原因，早就被当局划入了“贱民另册”，对当局不再信任，只是在设法明白当局的真实意图，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他们又想得到“宽大”，又不可能相信当局会原谅他们的“原罪”。这种人基本采取观望的立场，战战兢兢，走一步看一步。

政府对他们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

4. 第四种人。他们已经被当局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等，对当局的“阳谋”早已领教过了。他们明白办学习班，只不过是当局的另一种手段。他们往往采取“装傻充愣”的方式来应付当局的攻心战。政府对这种人采取假拉真打的策略，拿他们开刀达到“杀鸡警猴”的目的。

在认罪阶段，首先让每个人写一份“认罪书”。分成十至二十个人一组，在小组会上轮流宣读自己的“认罪书”，让其他“同学”来看他的认罪态度如何。其实只有军代表和指导员才知道他的“实际罪行”。同学都在看指导员和军代表的眼色后，才知道如何表态。

当时许多人是因“恶毒攻击罪”而被捕，也就是他们说了一两句批评、讽刺中央领导人的话，或者议论了领导人的隐私。现在又得坦白认罪，又不准重复“反动言论”，以免再次放毒。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运作。军代表和指导员们根据其他单位的“先进经验”制定出如下的认罪方式：凡是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在认罪书里应这样写：“犯了最大最大的罪。”凡是攻击林彪的言论，在认罪书里应这样写：“犯了第二大的罪”。攻击江青就是犯了第三大的罪，依此类推。

例如：我曾经说过：“毛泽东的诗‘七绝’，也可以‘素诗荤解’，解成一首香艳诗。”根据规定，在“认罪书”里就这样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我和某某人在某某人家，在谈起古典香艳诗的时候，我从诗词方面进行了恶毒攻击，犯了最大最大的罪。”

又如我说过：“林彪的长相很像京剧里的奸臣。”在“认罪书”就这样写道：“在外貌方面进行了恶毒攻击，犯了第二大的罪。”

再如：我说过：“江青曾经和王莹争演赛金花；没争上，结果只能演个小妓女。”在认罪书中就这样写道：“在戏剧方面进行了恶毒攻击，犯了第三大的罪。”

许多人根本没有攻击领袖的目的，只是由于口误或笔误被关进了监狱，例如：中国芭蕾舞团演员丁金诚案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在庆祝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的集体横渡下水时，天很冷；丁金诚带头喊口号，一紧张他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整个喊反了。当时就被扭送到公安局。据说他被关进看守所时，还只穿着游泳裤。

又如北京第二商业局鞋帽部会计范铸明案件。他在本单位开讨论会的时候，感到无聊，在一张白纸上胡乱涂涂写写，例如：“毛主席”、“刘少奇”、“反对”、“伟大”等等单词。会后一位积极分子拣到了这张纸，把那些单词串来串去，发现了反动标语。范被抓到公安局后还不知道为什么。

在认罪阶段，就是要每个人承认“犯罪事实”。政府采用“劝导”、“启发”、“批斗”等形式，其实就是软化了了的：骗供、诱供、逼供。一定要达到认定“罪证”的目的。

像我们这种“言论罪”，更要达到使我们“直供不讳”。我在群众专政时，已经打出来一百多条“罪”了。本以为到了学习班，政府既然要挽救你，一定会弄清事实。我刚一解释：很多话根本不是我说的，指导员立刻说：“这些罪都有人证明是你说的话，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证明你说过这句话，那就是铁证。证明你的都是革命群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相信党。’因此，完全可以认定，可以立刻判决你。但是看你是个年轻学生，还是可以挽救的。你连群众认定的事实都不承认，和群众对立，和党对立，政府怎么宽大你呢？从严从宽全在于你的态度。竹筒倒豆子是你的唯一出路，也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在群众面前你已经承认了，走出了可贵的一步。可现在你却又要翻供，毛主席说：‘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泥沼里向你招手呢。随时我们可以把你送回监号，也可以把你送回学校。两条道路摆在你面前，何去何从，你要三思。”

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下，我们明白只有承认“罪行”。我们多数人还天真地以为：政府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但必须得走这么个过场。也有人认为政府心里明白抓错了人，但政府得保住面子，可以先认了罪等出去了以后再翻案。就这样大多数人都认了罪。

但象范铸明等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抓他进来，政府怎么启发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哪一条？于是，指导员又布置各组的积极分子准备发言。还把抄来的范铸明日记进行分析，摘抄出当局认为暴露他反动思想的段落、诗词，分发给积极分子，作为批判他的资料和根据。

范铸明是个谨小慎微、自尊心强的普通职员，他父亲是个手工艺者：雕刻扇骨专家。这时政府硬说：他父亲是封建余孽。他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必然怀念昔日的天堂；必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从日记里、诗词里可以看出他的全部反动思想。

人们根据政府定的调子，秘密准备对范进行批判的发言稿。指导员事先安排好会议的程序。开会时，他先给我们作动员报告，要争取从宽必须靠拢政府，要大胆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话音突然一转：“抗拒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范铸明站到前面来！”立刻有几个小伙子冲过去把他推到前面，让他低头站在几十人前，接受“同学们”的批判。当然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程式化批判。虽然，他在入狱前已经被批判过许多次了，但这次还是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本以为政府真是要帮他澄清问题，要挽救他。没想到政府原来是要用另一种办法对他逼供、诱供。

后来才知道，他只是一个样板，人人都要这样过关。军代表找我谈话，说：“你只是一个青年学生，一个红卫兵小将。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喝两口水是免不了的。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听了这一番话我大为感动。他又说：“你们不可能编出那些谣言。肯定是有人告诉你们这些谣言，只要交代出你们的后台，你们只是传谣而已，若不交代出后台，那就是造谣，那么，罪行就非常严重了。你们只有一条出路：坦白出你们的后台，教唆你们的那些老家伙。”

当时我已经是主犯了，是别人交代出来的后台。当局还要我交代出后台。这时我明白了他们的目的是想抓出更重要的政治人物。这才明白我们不过是大人物赌桌上的筹码。学习班是用来压出更多的口供。我最多“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愿再连累年迈的双亲，矢口否认有任何后台。

第四阶段：深挖犯罪根源，狠批罪行危害：

1. 挖根：在约两周的认罪阶段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认罪和交代。当局

已经初步掌握了这些人的“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对这些人采取进一步加压。

要使确实认罪的人，“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从而在心里变成彻底“认罪伏法”，成为自觉自愿的、臣服中共当局的驯服工具。要使依然不认罪的人，在“挖根”阶段产生原罪意识。从而反过来自觉地给自己凑材料，找犯罪事实。政府要达到摧毁犯人最后心理防线的目的，这是“洗脑”的重要程序。

首先挖“阶级根源”。

第一种是出身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分子）家庭的人，要找出产生仇恨中共、仇恨社会主义的思想过程。要求必须要有“活思想”，要有“事实”，光给自己扣大帽子没有实际内容还是不行。许多“黑五类”读书人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明哲保身，根本不懂仇恨。这时必须挖出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刻骨仇恨”。交代的“仇恨”越深越是“态度好”。也需要有人作“样板”，原本没有仇恨，也要编出一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之类的“阶级仇恨”故事，才能过关。多数人并不知道，在你承认后，就成了政府可以随意处置的犯人。你已经“直供不讳”了，连思想根源都有了。已经做成了铁案。

据说如今王震（六四以后）还在用这老一套的故事，硬说赵紫阳对中共有“杀父之仇”，所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绿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平演变”铺平了道路。连中共的总书记都要遭到这样原始的清算，普通的小民又如何相信他们的无数的许诺。

有一位姓周的老工人，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六八年在北京屠宰场当工人，他的徒弟检举他在杀猪的时候骂了毛泽东。他在学习班依然矢口否认，军代表根据“阶级分析”，认为他“完全有可能说出这种话”，在学习班拼命给他加压，让他争取“坦白从宽”的唯一出路。他私下告诉我他从来没说过那句话，说：“我根本没拿么大的胆子。”在压供、诱供后他违心承认了，政府先表扬了他，然后仍把他送回了牢房。

（许多人不理解，中共为什么一定要制造一些阶级敌人？逼一些人必须恨他们，不恨都不行。精心制造一些“仇恨结”，只有这样才能为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找到充份的理由，在“杀鸡儆猴”的时候才能给残暴“虐杀”披上法律和道义的外衣。89年6月4日，又是一套周密的“虐杀”计划的理性安排。）

第二种是出身于资本家、小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这些人也必须交代家庭对自己犯罪的影响，必须承认“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一直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许多在学习班的这种人，“解放”时只是一个小孩，根本没有这种思想，这时就只能违心出卖亲生父母，否则无法过关。在这样的改造后，自然人格分裂为双重。

第三种是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必须交代“如何背叛了阶级”，受了谁的影响，例如老师、朋友、同学、亲戚。这些人也不得不苦思苦想，设法找出来一个“根源”。就这样株连出一系列“教唆犯”、“黑后台”。有一位中技学校的学生，在武斗中打死了人，这时就被迫交代某个老师影响了他，使他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罪行”。于是就牵连了那位老师。

第四种是出身于“革命烈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人。这些人的父母如果是属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的对象，他们必须交代出父母的“不满言论”，甚至“反动言论”。要查三代，是否祖父母是剥削阶级出身，或父母在

中共历次运动中曾被整肃过、批斗过。如果是，那么就是对党和领袖心怀不满，属于“阶级异己分子”。如果不是，则要回忆父母的同事、朋友、亲戚们都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之间有什么“组织”、“集团”之类的活动。

例如：江青当时一心要抓出说她三十年代在上海风流韵事的“造谣者”。在此前抓过一批“联动”。其中包括曾经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代表全国红卫兵讲话的彭小蒙。由此顺蔓摸瓜，抓了她的父亲彭炎（当时是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母亲阮波。借此再抓出他们的“战友”、同事，扩大成一个“反党集团”。彭炎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和我们在同一个学习班。

在这个阶段，当局千方百计地要我们交代出“根源”，想找到我们父母的“罪证”。由于未遂，当局就决心对我们从严处理。

其次是挖思想根源。

要每个人找出犯罪的“原始动机”。当局用这个程序把你逼到死角，让你进入单向程序，无法翻案。例如：当局要我找出“反动思想”最后的黑根。我的“罪行”是“言论”，我就交代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好出风头。当局说：不对，这是避重就轻。最后在政府“帮助”下，我承认说：我想走“白专道路”，“学而优则仕”。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字是万恶之源。这样交代后才勉强过关。

2. 批害：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又进入自我批判阶段。必须批深批透。每个人都设法找出最高级、最严厉的词句，进行狠批。

例如：曾被“劳动教育”过的学生王亨利，自我批判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反动派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连狗屎都不如，我就是狗屁。”军代表认为那样说太轻了。王亨利就说：“我是狗屁里的屎星。”军代表认为虽然庸俗，还算贴切。

我只好说：“我的反动言论使得世界革命受到了影响，使人类大同晚几秒钟。而在这几秒钟，就可能有千百万人头落地。那么，我的罪行就大大超过了普通的杀人犯。”就这样才使得军代表满意了。

总之，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犯人们已经被当局摧毁了最后的心理防线，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任人处理，任人宰割，“一生交给党安排”。

#### 四、宽严大会

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左右，在半步桥44号北京看守所的北院学习班，召开了一次“宽严大会”。

先是做三件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学习“老三段”。高唱“东方红”。然后由武代表讲话，再次重申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接着由李代表宣布：“将杨某押上来。”几个安排好的积极分子，迅速地把杨某扭送到台前。两个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李代表接着说：“杨犯一贯不老实，抗拒改造，拒不认罪。在学习班这一阶段，仍然不思悔改，继续捣乱。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顽固反动派的下场。现在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性，把现行反革命犯杨某押回监号！”这时口号四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现行反革命杨某！”在口号声中，杨某被押回牢房。这时气氛十分沉重。

武代表再次讲话：“同学们：我们伟大的党说得到，做得到。政策一定要兑现。请看：周某入狱后痛改前非，认罪伏法，。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她决心洗心革面，做个自食其力的公民。并且积极靠拢政府，向政府交心，有了立功表现。今天宣布：立即释放，免于起诉。”这时口号四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口号声中周某在两名女警陪同下，离开了会场。全场一片羡慕的目光。就这样当场“从严”了一名，“从宽”了两名。

这时，大家均感到意外，以为学习了好几个月了。政府应该准备整批地释放学习班的犯人了。如今，只放了两个人；人们隐约觉得不能过于乐观。

## 五、无偿劳力

政府又安排下一段的改造，“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于是我们开始每天十几小时的体力劳动——给北京看守所挖防空洞。多数人都发给一把铁锹，挖两三米的深沟。那是极为繁重的土方活。我和彭炎老先生等因为年老或身体欠佳，分工干“轻活”——推车运土。每天风雨无阻，疲惫不堪。晚上往往由于太累，连洗都不洗就和衣而卧。由于是未决犯，连每月的劳动津贴都没有。一切生活用品还要靠家里送。

一天，收工时排队，彭炎老先生对我说：“现在我才明白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真谛：为什么工人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后来才听说，中共中央已经下了命令：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各单位，各家各户都在挖防空洞。就这样，我们在“用汗水洗刷罪行”的大旗下，替公安局当免费劳动力。一连干了几个月。政府每个月总要放一两个人，给人们以希望。“学习班”至此徒有其名了，实际成了“劳动班”。

## 六、起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为“三保卫”（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要把重要的政治犯，转移出北京。

一天傍晚，军代表宣布紧急集合。我们许多人以为政府准备放人，也有许多人觉得不像放人的气氛。集合后，军代表立刻宣读了一个一百人左右的名单。其中包括我。要求我们立刻收拾行李，立刻出发。我们十分钟后，已经背着行李排好了队。军代表没有任何解释，只是下令：“向右转！齐步走！”一出小院门，才看见在昏黄的路灯下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我们在口令下返回牢房。

三天后我们被下放到县监狱去了。

这样的“政策兑现”，谁还再敢相信？

□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号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 <cm@cnd.org>](mailto:cm@cnd.org)  
本期 校对： 吴慈仁（香港） <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关蔚禾（美国） <info@cnd.org>  
《华夏文摘》代主编： 徐名扬（澳大利亚） <cord@cnd.org>  
《CND》总编： 温 冰（加拿大） <manager@cnd.org>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  
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ftp.cnd.org) [149.159.2.6]： pub/cnd/hxwz

或 [canada.cnd.org](ftp://ftp.canada.cnd.org) [142.132.12.100]： 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